

丹山順藝—— 論其學問與藏書^{*}

萬波壽子^{**}

提 要

眾所周知，江戸時代（1603-1867）末期的一代學僧丹山順藝（1785-1847），是繼江戸時代中期的僧侶忍微（1645-1711）後，採用日本近世期評價最高的建仁寺藏高麗版大藏經為校本，並對黃檗版大藏經進行了嚴密校訂的僧侶，但至今卻未見關於順藝之詳細討論。順藝的學識能力與面對經典的嚴謹態度，於江戸時代實屬罕見。

首先，關於其嚴密校正大藏經的態度，與忍微不同，順藝更具有正確抄寫高麗藏的執著精神，由此可推斷其目的也許在於得到更正確的文本。

此外，順藝也曾嘗試復元其宗祖親鸞（1173-1263）的重要著作，這於主要用刊本來學習佛學的江戸時代來說，也屬相當與眾不同的行為。此外，順藝的藏書目錄結構特殊，頗具大藏經的風格，該目錄仿效江戸中後期的同宗他派的學僧智洞（1736-1805）編《龍谷學鬻內典現存目錄》。智洞的目錄是將嘉興藏脫胎換骨，增加了日本的佛書，重新組構的一大佛書目錄。另外，順藝還是位收藏家，其藏書中包括大量的古寫經及手抄本。順藝重視刊本以外的古寫經之嚴謹態度，這一點已經初具近代佛教研究手法的特徵。

關鍵詞：丹山順藝、黃檗版大藏經、高麗版大藏經、出版文化、坂東本、古寫經

* 收稿日期：2021年2月18日；通過刊登日期：2021年12月2日。

** 日本龍谷大學兼職講師・JSPS研究獎學金（RPD）

一、前言

大正新脩大藏經（以下簡稱大正藏）當前可謂世界共通，國際公認的佛教研究文本資源。該叢書，無論在宗教研究中，還是在佛教學以外的領域都被廣泛使用，今後也將日益發揮其影響力。大正藏依據的底本，是日本近世淨土宗寺院增上寺收藏的高麗版大藏經（即再雕本高麗版大藏經，以下簡稱麗藏）。

在眾多的刊本大藏經中，麗藏作為最優異文本的口碑，樹立於日本近世。其決定性的契機，緣於一六〇〇年代末黃檗版大藏經（亦稱鐵眼版大藏經，以下簡稱黃檗藏）刻成後，日本淨土宗學僧忍微採用麗藏與黃檗藏進行的嚴密對校。事實上，在忍微之後的幕府時代末期，眞宗大谷派的學僧丹山順藝，同樣以其極盡嚴密的本文校訂能力和閱覽善本的熱情，採用麗藏校訂了自家寺廟收藏的黃檗藏，全藏各校三遍。

和忍微相比，順藝的知名度不高，但其學識之淵博，為學態度之嚴謹，藏書質量等方面都非同凡響。在此，本篇論文將通過討論順藝的學問、藏書目錄等，揭示順藝採用麗藏檢驗大藏經文本的主觀意圖和客觀環境。

二、丹山順藝其人

丹山順藝是江戶時代晚期的僧侶，其為以東本願寺為本山之龐大佛教組織中之眞宗大谷派學僧，生於天明五年（1785），弘化四年（1847）過世，享年六十歲。生前擔任福井縣越前町下絲生的淨勝寺（淨土眞宗大谷派）第十三世住職。俗姓上野，號信珠院、丹山等，七歲時拜香月院深勵（1749-1817）為師精研學問。其師深勵，後來致力於研究佛學。此外，其相當有文采，留下許多漢詩集及和歌集等著作，並與當時的著名漢詩人兼歷史學家的賴山陽（1781-1832）及國學研究家兼歌人的賀茂季鷹（1754-1841）等當時的著名文人都有交流。他留下的詩歌現由鄉土史學研究家山田秋甫將其彙整成書。¹ 順藝生前在家鄉德高望重，在世時曾雕刻了八座自己的雕像，至今仍被視為當地的歷史偉人之一。

1 山田秋甫，《淨勝寺丹山》（福井：丹山文庫，1914）。和歌及漢詩則收錄在山田秋甫，《淨勝寺丹山歌集》（福井：丹山文庫，1914）。

但研究順藝的論文並不多，其著作於生前刊行的只有校訂本《金剛般若經贊述》，此外尚有《稱名信樂二願希決》、《御文研鏡》和《讀言南無者釋》等淨土教和淨土真宗的聖教研究著作，但除了《稱名信樂二願希決》之外，其他的著作並未受到重視。順藝有時被視為大藏經研究的先驅，卻非日本近世佛教學上的知名人物。關於順藝的先行研究，大多僅僅提及他的經歷或業績而已，相關研究如下：

1914 年：山田秋甫，《淨勝寺丹山》。

1932 年：金子大榮，《信珠院順藝師宗典研究稱名信樂二願希決》。²

1935 年：岡井慎吾，〈丹山師の校藏始末〉，收入《柿堂存稿》（著者私版）。

1982 年：田代俊孝，〈越前丹山文庫所藏麗藏校合黃檗版一切經について〉。³

2008 年：越前町教育委員會編，《丹山—幕末を生きた學僧—》。⁴

除此之外，由於順藝為真宗大谷派的高僧，於《真宗大系》等著作中都有介紹他的事蹟。⁵ 上述研究當中，山田秋甫的《淨勝寺丹山》屬於基礎階段的研究，重點在於順藝相關資料的收集，而並無進一步的探討。順藝雖於大藏經研究史上有被關注介紹，但在日本江戶佛教史上並未被認定為著名人物。

筆者認為，要想全面理解順藝的大藏經校訂事業的客觀背景，需要分以下幾種事項多方考證。首先，需要討論順藝自身的學問特徵（注重本文內容的嚴密性，貴重書的蒐集能力，作為可能性的坂東本研究），其次要關注他對早前成書的特殊目錄的繼承，最後則是在古寫經方面的收集等。下文將依次考察。

2 金子大榮著，讀言南無者譯，《信珠院順藝師宗典研究稱名信樂二願希決》（京都：文榮堂書店，1988〔1932 初版〕）。

3 田代俊孝，〈越前丹山文庫所藏麗藏校合黃檗版一切經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0 號 2 期（1982.3），頁 230-234。

4 越前町教育委員會編，《丹山—幕末を生きた學僧—》（福井：越前町織田文化歷史館，2008）。

5 《御文研鏡》，收入真宗典籍刊行會編，《真宗大系・第 32 卷》（東京：真宗典籍刊行會，1918），頁 55-113；《稱名信樂二願希決》，收入妻木直良編，《真宗全書・第 55 卷》（京都：藏經書院，1915），頁 353-434。

三、文本研究

關於順藝的學問，其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對文字解釋的嚴密和細緻。真宗大谷派的僧侶，佛教學者金子大榮評價順藝的學問時，指出「丹山宗學的特徵，第一點就是對聖教文字解釋的嚴密與細緻。」⁶

順藝的老師深勵以追求文字的正確度為其特徵，其學派叫做垂天結社，是真宗大谷派中最大學派之一，門生多達千二百四十九人，順藝乃其中造詣最高的弟子之一，深得恩師深勵的真傳，對聖教文字解釋極盡嚴密，其嚴謹度甚至勝過恩師深勵。

（一）窺基撰《金剛般若論會釋》的校訂

以窺基撰《金剛般若論會釋》三卷為例，順藝在三十二歲前後，就已經採用奈良東大寺龍松院的手抄本為底本，極盡慎重地進行了多次校訂。先於文化年間（1804-1818）進行三校，次於文政年間（1818-1830）再三校，前後整整經過六次校訂。這一事實，從順藝的親抄本的下述題跋可見端倪：

（下卷末尾所附文化年間的題跋）

右金剛經會釋全部三卷，客歲夏五月，借得南京東大寺（筆者註：「寺」字之左補入「。大佛殿」）勸進所龍松院所藏本，荏苒踰年今文化十三年丙子春正月五日，遂謄寫功了，順藝志道三十又二，同年夏六月十九日一校了，升一日再校了，升三日三校了，無隻字之差也。

（下卷末尾所附文政年間的題跋）

文政二年己卯八月十七日，借得南京龍松院之藏中一本，校合了，同四年辛巳冬十二月廿四日再校了，同五年壬午夏四月念八日三校了，會釋三卷，前一卷校合先所得一本，及龍松所藏二本后二卷唯校檢，龍松藏二本，文化五年壬午四月廿八日夜，於洛東岡峇宕舍成功，釋順藝春秋三十有八。⁷

6 金子大榮，《信珠院順藝師宗典研究稱名信樂二願希決》，頁17。金子大榮（1881-1976），真宗大谷派僧侶，日本近代佛教學者及思想家。金子大榮憂慮順藝的功績及學識為後人遺忘，因而著有《信珠院順藝師宗典研究稱名信樂二願希決》一書，並將其出版。

7 《金剛般若經會釋》，大谷大學圖書館藏（請求記號：餘大2373）。

觀其校訂本《金剛般若論會釋》內文，可見文化年間的校訂使用紅字，文政年間的校訂採用青墨書寫，另外隨處可見順藝擬定的合理文字。例如，下卷開篇處的「內寔至理」，在「寔」字的左側青墨書寫「實」字，此乃文政年間的校訂。同時，該字的右側墨書校注「冥力」二字，表示順藝認為作「冥」字更為合理。

此處，無論底本的「寔」字（意為堵塞洞穴），還是校本（龍松院本）的「實」字，都不甚通順。而與兩者字形近似的「冥」字（意為道理不通）在文意上則較為通暢。值得注意的是，順藝不僅在各本之間的文字異同上極為嚴密，他的校訂工作建立在對經文意思的精確理解之上。最後，順藝親筆抄寫的《金剛般若論會釋》，是大正藏的校訂本之一（即「文化十三年寫大谷大學藏本」）。

（二）《金剛般若經贊述》的校訂

另外一例展示了順藝的學識和校訂能力過人的作品，就是《金剛般若經贊述》。這是順藝生前唯一出版過的（文化十三年〔1816〕刊）編著作品，附有恩師深勵的序文，如同後述本書出版權後來移轉到學寮，可謂順藝作為學僧的出發點。

該書出版四年後的文政三年（1820），順藝本人於東本願寺的檀林高倉學寮夏安居裡，⁸採用了《金剛般若經贊述》做講學授課用的文本。估計本書是順藝為了此講課內容而收集衆抄本後校訂過的研究成果。另外，根據高倉學寮代代事務局長記錄的《上首寮日記》記載，順藝將自己出版的該書的版本（印刷的原版）於文政八年（1825）七月三日贈於高倉學寮全書。此外，此書版本共三十一枚，其中一枚則置於書肆。

在近世，版本所屬代表了出版權的所在，版本的讓渡則意味著版權的讓渡。也就是說，學寮在此狀況下幾乎擁有大部分的版權，但由於版權的版本的一部分歸屬書肆，所以書肆也擁有部分版權。這也意味著學寮同意該書的印刷製本等由該書肆主持，並將此流傳至教團內。學寮用意在於將該書作為正規的出版物在檀林內部頒行。

該作品在比較《金剛般若經贊述》內文的異同之際，不僅採納了包括奈良興福寺學頭所藏三件傳本在內的六件寫本，此外在《金剛般若經贊述》本文中的頭

8 「夏安居」為淨土真宗於各學寮舉辦的夏季講習會，通常由身為學寮長老的講師進行聖教類的講習課程，而聽講者為已得到一定位階的僧侶。

注上標記其校正時採用了「宋本」、「明本」、「高麗本」。其校正時用的三種大藏經本，其中的「宋本」具體所指不明，但應該是知恩院藏書。⁹知恩院是位於京都的日本淨土宗之總本山，這裡所藏的一切經為開元寺版或東禪寺版大藏經的混合版本。「明本」為嘉興藏，或是其復刻版的黃檗藏，「麗本」顯然是高麗藏。

另外，如同前提的《金剛般若論會釋》，順藝於校正時會擬定其認為合理的文字或內容，並於本文中的左側或下方標記「。」，並於頭注中標示其校正內容。舉例來說，在「既唯退失」中，順藝於「唯」字左側標示「。」，並於頭注中寫上「唯疑得」，註記其認為此字非「唯」而比較有可能是「得」。並在其認為有文字脫落處寫上「疑脫」，且在認為此處應為多出來的地方標注「疑剩」等，於頭注上註記其認為合理正確的內容。這可看出順藝於比較各個抄本後，進而推測其更為合理的文字並努力接近原來文本內容的嚴謹態度。

《金剛般若經贊述》的裝訂，一行二十字，一葉四十行的格式明顯是承襲當時標準格式的黃檗藏。順藝不只特地以當時任何人都知曉的黃檗藏為標準格式並加以做校正，且在頭注處標注自己的意見，致力於完成文意通順的完整本文（圖1、2）。

而且，從順藝於頭注中標注的「明本」、「高麗本」中也可了解到，順藝是為了在學寮中授課做準備，才著手收集《金剛般若經贊述》及與其關聯的文獻，其同時也調查了許多的大藏經，並也在調查過程中深刻感受到高麗藏為保存狀態最佳的本文。而這也成為他日後將高麗藏作為校本來校訂自家的黃檗版大藏經之契機。

此外，順藝校訂的《金剛般若經贊述》日後也成為大正藏的底本。

四、坂東本的研究

順藝的業績當中，最引人矚目的就是他摹寫的坂東本《教行信證》的精確抄本。《教行信證》是淨土真宗開祖親鸞的代表作，該宗的根本聖典。所謂坂東本，

9 田代俊孝〈越前丹山文庫所藏麗藏校合黃檗版一切經について〉中有介紹於淨勝寺所藏《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之跋文，且於內文中有提到「知恩院所藏宋本校合畢合」。

是親鸞真跡本《教行信證》的傳世孤本。在江戶時代，坂東本《教行信證》由親鸞的門下性信（1187-1275）所創真宗大谷派寺院坂東（關東地方）報恩寺歷代傳持。江戶時代時已有許多人知道該書的存在，於淨土真宗中也算極為秘傳的典籍。

順藝共製作過兩件坂東本的精確抄本，即現藏於大谷大學圖書館的「丹山文庫本（禿庵文庫本）」和「舊高倉學寮本」。此外，年代相近的還有天保十一年（1840）明清寺本，順藝製作本大概與其同時。

丹山文庫本不但對明治大正期的真宗學界貢獻極大，大正十二年（1923）九月關東大震災中坂東本受損，平成十五年（2003）修復之際，丹山文庫本發揮了重要的參考價值。

坂東本的抄本，另外還有內事局本和教行寺本等，都是近世中期的手抄本，內文不乏錯置之處。其原因在於底本的坂東本傳至近世期，出現了紙張前後倒置的現象（現在已獲修復）。但是，丹山文庫本、舊高倉學寮本、明清寺本，不存在類似的錯誤。¹⁰

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顯示修正錯簡的就是順藝本人，但是考慮到順藝的師承淵源學問傾向，精細的本文校訂造詣等學識能力，不能否認順藝具備糾正錯簡的能力和復原文本的可能性。順藝的藏書中包括衆多的教行信證的相關史料。例如，其藏書目錄記載了江戶時代民間出版的所有四種刊本（江戶末期極為罕見），智暹（1702-1768）（他是江戶時代中期末期的一名僧人，閱讀了大量佛教文獻，並與總院的西本願寺展開激烈爭辯。《教行信證樹心錄》，玄智（1734-1794）（他被認為是位精通歷史的傑出學者，修訂並出版了許多罕見的佛教文獻。）《教行信證光融錄》等歷代注釋書多種。另外，深勵講解《教行信證》時採用的六種《教行信證》延書，¹¹全部製作了手抄本。文政八年（1825），還以江州金堂弘誓寺本為底本，其他五書為校本，實施了細緻入微的對校。此外，順藝還製作了《教行信證傳授記錄》（大谷大學圖書館藏）的手抄本，該錄記載了直至文化十五年（1818）為止的《教行信證》傳承記錄。¹²可見，順藝掌握了衆多和足夠的《教行信證》相關資料。因此，修正錯簡的應該就是順藝本人。

10 鳥越正道，《最終稿本教行信證の復元研究》（京都：法藏館，1997），頁96。

11 「延書」是指將難懂的中文原文轉換為可讀的日文形式，以使其更容易理解的書。

12 上杉文秀，《〈教行信證〉御延書本に就て》，《宗報》，246號（1922.4），頁2-3。

應該說，雖然只為修正，但在被視為聖典的坂東本上進行變動本身就是相當罕見的行爲。坂東本在江戶時代前期就已家喻戶曉，但長期以來屬於鎮寺之寶，極少提供閱覽，阻礙了對該書的學術分析。¹³

本來，近世期的《教行信證》研究即以刊本為基礎，採用珍貴手抄本為底本的研究尚屬空白。第一位衝破制約採用坂東本開展研究的學僧是順藝的恩師深勵（他為一名以尋求正確解釋佛教經文而聞名的學者），此有江戶後期的享和三年（1803）到文化三年（1806）之間的深勵講義記錄《廣文類會讀記》為證。

但是，深勵自身唯有抄寫過坂東本。其講義錄中可見「祖師之真跡坂東本吾也尚未直接見識過，但吾之友人曾親眼見過坂東本並曾抄寫過，因我打算使用這個手寫的副本」之記錄，¹⁴可見他在講義中使用的是他人手抄的坂東本。另外，深勵採用了坂東本的手抄本進行研究，但並未將該本作為核心文本。

相比之下，順藝著眼於坂東本本身，並且製作了精緻到真假難辨的摹寫本。近世期的《教行信證》研究向來以刊本為主流，但順藝堅持臨摹親鸞真跡的坂東本，並修正其錯簡，使坂東本能恢復到接近原典的狀態。順藝沒有拘泥於傳統的固有方法，表現出尊重原典的學問傾向。

五、麗藏的對校

（一）日本近世的佛書出版

順藝最偉大的業績，莫過於大藏經的校訂事業。他採用當時收藏於建仁寺的麗藏，來校訂日本近世廣泛流通的黃檗藏。同樣的校訂偉業，早在一世紀以前，曾由淨土宗學僧忍微首次完成。那麼，忍微和順藝的差異何在呢？

忍微著手對校大藏經的時代，時值日本自中世向近世過渡，佛教的變革深入人心的時期。這一歷史階段的時代特色之一，就是易於入手的刊本被應用於教育和研究當中。換句話說，江戶幕府執政時期，各大宗派為了重整教團的體制，在

13 藤原智，〈江戸期における坂東本《教行信證》の活用（上）〉，《教化研究》，166號（2020.7），頁218-219。

14 《廣文類會讀記》，卷11，收入真宗典籍刊行會編，《真宗大系・第14卷》（東京：真宗典籍刊行會，1926年改版），頁692。

教育和必要的教學研究方面不遺餘力，在全國範圍內創辦學寮。在這樣的風氣下，作為教育和研究的基礎的佛書，尤其是基礎性文本和注釋書的需求高漲，催生了日本最初的出版產業。日本史上的出版文化的誕生，是近世前期新佛教興隆的產物。¹⁵

在佛教方面，也受益於出版文化興盛，許多佛教書籍並獲得了更多的機會得以出版，中世之前的基礎性經典和注釋書以刊本形式日漸普及，時至一六〇〇年代末期，《教行信證》、《選擇本願念佛集》等宗祖代表著作，也普遍依據刊本學習。¹⁶ 佛教書籍一旦得以出版，就會在江戶時代持續被廣泛閱讀使用，這樣其佛學研究成果也得以長期被各階層的人所共享。日本近世佛教，由於出版文化的發達使它獲得與以往封閉的日本中世佛教完全不同的獨特性，並在普及度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二）忍徵的校訂事業背景

當然，對於包含所有的佛教文本的大藏經之關注度也日益升溫。例如，妙心寺的了堂禪師（1587-1664，他為了自身的戒律復興運動，積極尋找優良文本，並瀏覽了許多大藏經）置身南都春日野閱藏長達十六年，完成了百餘卷巨著《大藏經の撮要》。¹⁷

由於各大寺院收藏的大藏經都是貴重的鎮寺之寶，限制閱覽，民間對於便利的刊本大藏經的需求日漸高漲。近世期日本開版的大藏經，包括宗存版、天海版、黃檗藏。其中，宗存版和天海版採用木活字版技術印刷，耐久性極低，印製部數有限。並且折本裝幀使用不便，普及率極低。

從學術利用的角度而言，最為普及的大藏經是天和元年（1682）完成開版的黃檗藏，全藏二百七十五帙、一千六百五十四部、六千九百九十五卷。黃檗藏，由黃檗僧鐵眼（1630-1682）發心雕版，以明代嘉興藏大藏經（明藏，以下簡稱嘉興藏）為底本，最顯著的外形特徵是模仿嘉興藏採用冊子本裝幀。採用耐久性

15 關於近世期的佛書出版，參照拙著，《近世佛書の文化史—西本願寺の出版メディア—》（京都：法藏館，2018）。

16 根本聖典的刊本成為教育和研究的前提的事例，參照三浦真澄，《〈教行信證〉傳授の一試論—寂如上人御講義を通して—》，《真宗學》，140號（2019.3），頁89-91；齊藤隆信，〈義山の元祿新彫《撰擇集》に見る浄土宗學の一側面〉，《浄土宗學研究》，39號（2012），頁140-141。

17 川上孤山，《增補妙心寺史》（京都：思文閣，1975），頁449。

較高的整版印刷技術，版式爲一葉四十行、一行二十字。版心註明三藏等分類、典籍名、卷數、葉數、千字文卷次等，便於閱覽、引用，實用性遠非傳統的卷子本、折本形態經典所及。

黃檗藏的發行人至少有二千二百二十五藏，是近世期佛教學的基礎性文本資源。京都的貝葉書院至今仍在銷售黃檗版大藏經。

黃檗藏的出現推動了以其爲前提的佛學研究。例如，華嚴僧鳳潭（1657-1738）以其激烈的經典論爭聞名，他胸懷強烈的探索心遍搜各地藏書，黃檗藏問世後即通覽全藏，並羅列了有必要追加加入藏的教典書目，編撰了《扶桑藏外現存目錄》。該目錄記載了典籍的所在地和發行所，資料價值很高，現在收錄於大正藏附錄《昭和法寶目錄》第二卷（即「扶桑續入總目錄」）。

時代稍後，眞言宗的學如（1716-1773）參考黃檗藏，指出麗藏中多見異體字。明和八年（1771）將麗藏本《根本薩婆多部律攝》十四卷，改版爲黃檗藏的一葉四十行、一行二十字的形式出版。不但版式易讀，附有訓點、假名等，便於初學者的經文理解，其面向的讀者層，不僅學僧，還包括普通的在家信衆。¹⁸

此外，以黃檗藏爲首的各類版本，成爲當時學問研究的共通教材。黃檗藏於一六〇〇年代末問世，忍徵以麗藏校訂該藏爲一七〇〇年代初。黃檗藏作爲佛教學的整體，或是國學、儒學等學問整體的共通教材，其準確性需要給予驗證。而檢驗的結果，有必要以出版的形式公諸於世，這才引發了《一切經音義》和《大藏對校錄》等成果的公開。

（三）忍徵的校訂

在日本，以麗藏爲底本製作的個別經典，出現於承應二年（1653）以後。江戸時代前期，建仁寺麗藏的閱覽和以此爲校本開展大藏經的校訂也成爲可能。但是全面開展校訂並首次揭示建仁寺藏本全貌的，乃是淨土宗學僧忍徵。¹⁹ 忍徵注意到黃檗藏中存在意思不通的經文，因此於寶永三年（1706），採用建仁寺本麗藏與

18 山田秋甫，《淨勝寺丹山》，頁 34。

19 忍徵爲淨土宗高僧。他曾再度復興淨土宗開祖法然爲了教化活動而以當據點的京都鹿之谷之法然院萬無教寺，並自詡爲中興二世。他致力於信仰的實踐，宗典基礎研究與宣揚宗風，並留下來了許多領先當代的功績。

黃檗藏各對校三遍，校異結果記錄在黃檗藏中。該嚴密的對校工作耗時 5 年，完成於寶永七年（1710）。

在校對過程中，忍微發現麗藏中收藏了黃檗藏中未見的《一切經音義》百卷，並在弟子們的協助下於元文二年（1738）開版印製。原計劃將自己的麗藏校異記錄《大藏對校錄》以百卷形式出版發行，但法然院藏本僅編至五十六卷即半途而廢。²⁰ 觀其出版計劃，忍微意欲將對校成果公諸於世的態度可見一斑。

忍微的對校事業，確立了建仁寺麗藏作為善本大藏經的定位和口碑，黃檗藏經文存在謬誤的事實也遍傳佛教界。²¹ 但是，由於黃檗藏便於取得和利用，作為日本近世的基礎性文本最終得以普及。

至於建仁寺本麗藏，經過天保八年（1837）的火災，現在僅存四十八函、三百三十七帖、一百二十四冊。²²

（四）順藝的校訂

以往順藝的修訂版麗藏被等同於是與忍微共同完成的作品，沒有被特別注意到它們之間的差異。然而，田代俊孝調查了順藝所屬的淨勝寺，並於 1982 年對順藝的修改工作做了粗略的報告。它是一份名為〈越前丹山文庫所藏麗藏校合黃檗一切經について〉的報告。該報告指出了以下幾點。首先，他修改了麗藏和檗藏的所有共同部分的文本。此外，其中約有三百卷是抄寫忍微校訂版之後，用於與麗藏的修訂工作，而那些麗藏中有但檗藏中沒有的內容，則特地抄寫將內容補上。

近年來，松永知海還調查了淨勝寺的大藏經。在〈黃檗版一切經の話－鐵眼禪師の出版事業と越前－〉中，松永報告了順藝校定文本的特點。²³

時至一八〇〇年代的江戶後期，順藝通過校訂《金剛般若論會釋》和《金剛般若經贊述》，意識到麗藏的優越性，最終將其與黃檗藏開展對校。順藝的父親順慧（1761-1836，儘管被認為具有高深的佛學知識，但目前尚未有關於他的主要研

20 川上孤山，《增補妙心寺史》，頁 449。

21 馬場久幸，《日韓交流と高麗版大藏經》（京都：法藏館，2016），頁 270。

22 松永知海編，《秋季特別展・高麗版大藏經の諸相》（京都：佛教大學宗教文化ミュージアム，2012），頁 107。

23 松永知海，〈黃檗版一切經の話－鐵眼禪師の出版事業と越前－〉，《越前町織田文化歴史館研究紀要》，4 集（2019.3），頁 52-54。

究)爲了支持對校事業,爲自家寺廟淨勝寺購置了黃檗藏,該藏的五千四百三十卷,自文政三年(1820)到天保二年(1831),分四十三批陸續入藏淨勝寺。同時,順藝從獅谷(法然院)借閱忍微校本抄寫,中途受挫,似乎沒有完成全部的抄寫。²⁴

文政五年(1822),順藝拜見建仁寺的通銓(生卒年未詳),請求以建仁寺本麗藏對校,但通銓以翌年將赴任對馬爲由回絕。順藝並不氣餒,持千兩向對馬國木坂神社請求借閱麗藏,該神社以國禁爲由回絕。直到文政八年,通銓自對馬歸京,順藝再度重申訴求,而最終獲准。

翌年,順藝率二子順尊(?-1871)、賢護(生卒年未詳),以及伊勢傳善寺大慇(生卒年未詳)、近江泉福寺香巖(生卒年未詳)等人(關於大慇和香巖兩人目前尙未有深入的探討及研究)前往建仁寺,於寺內堆雲軒設校合所,著手展開對校工作。順藝過世後,香巖在《大藏經校合の記》中追憶如下往事:

於此,用高麗版大藏經校正明藏復刻版(黃檗版)大藏經,並將錯字或脫落字一字不漏地找出……(中略)若只校正一回必然會有失誤,校正兩回也依然難以避免有誤,於是乎盡可能每卷都至少校對三回……。²⁵

由此可知,當年的對校工作爲求嚴密,每部經典各對校三遍。與忍微的校正相比,「本次的校正作業中,即使是同樣字意的字也會考慮其字形問題,或文字抬頭位置之差異,亦或是文章中字類(筆者註:也許是指文字種類或大字及小字等差異),也都予以詳細記錄。」順藝對忍微未進行校對的則天文字等異體字或別體字也給予對校,更忠實於建仁寺本。²⁶

這項事業耗時十一年的歲月,於天保七年(1836)方才初步完成。天保八年二月,通銓爲紀念對校事業的完成,請順藝撰寫藏室碑文,由朝鮮官人紫霞申緯揮毫。經過對校的黃檗藏,主體部分仍收藏於淨勝寺,昭和五十九(1984)被指定爲福井縣文化財。

24 山田秋甫,《淨勝寺丹山》,頁34。要知道順藝抄寫多少份量,只需查閱現藏於福井縣淨勝寺之順藝所校定《黃檗版大藏經》即可明瞭狀況,但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狀況嚴重,尚無法前往閱覽確認。

25 《大藏經校合の記》,大谷大學圖書館藏(請求記號:餘大6677)。

26 松永知海,〈黃檗版一切經の話—鐵眼禪師の出版事業と越前—〉,頁54。

（五）宗派内部的矚目

現藏於淨勝寺的黃檗藏《大乘成業論》中，保留了一則天保八年（1837）丁酉冬十月廿八日，於建仁寺完成一校的題跋。也就是說，建仁寺遭遇火災的天保八年九月以後，順藝等人仍然依據殘留的經典進行校對，²⁷ 足見建仁寺對他們的信賴，想必也取得了東本願寺的理解和支持。

順藝校訂的黃檗藏，在他生前的弘化元年（1844）十一月五日，曾有人提出請求借閱：「越前淨勝寺丹山順藝寮司校正的一切經中，有人提出想暫時借閱《十住毘婆沙論》中之《易行品》，因而想知需如何處理。」²⁸ 內容提到三河淨妙寺義舜（生卒年未詳）想借閱順藝校訂後的黃檗藏。

東本願寺的主力家臣栗津家的記錄《栗津家日記》中言：「聽說丹山順藝校正之的一切經幾乎已完成，剩下內容等順藝康復後再予以完成並收藏進本山中。」可見此時奉命製作的第二藏的主體部分已經完成，而順藝處於病中。由於義舜的品行不佳，此次借閱一事不了了之，當時申請閱覽的想必大有人在。還有借閱請求等相關記載，不難看出當時至少東本願寺教團內部對順藝的校訂事業還是有所關注。

（六）順藝的校訂分析

忍微完成了黃檗藏的檢驗後，曾有計劃公開成果。但順藝雖然完成了嚴密的校合工作，卻無心公開此事，看來他的用意僅僅在於經文本身的校勘。他的低調傾向，在早年的《金剛般若論會釋》、《金剛般若經贊述》校訂時已經顯現，可謂順藝的一大特點。他多方尋求周圍的理解和助力，鍥而不捨，態度嚴謹，目的純粹，就是要尋獲近世期最高善本的麗藏文本。經過順藝校訂的黃檗藏，堪稱「高麗藏一本建立」的「三國無雙之善本」（《大藏經校訂記》）。可以認為，順藝的目的是完整地複製「建仁寺本麗藏」的文本。

順藝的對校事業初步告終後不久，天保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建仁寺遭遇火災，該寺的麗藏大部分毀於一旦。得知此事的本山東本願寺，於天保八年（1837）

27 松永知海，〈黃檗版一切經の話—鐵眼禪師の出版事業と越前一〉，頁 54。

28 《栗津家日記》，收入東本願寺宗學院編修部編，《東本願寺史料・第2卷》（東京：名著出版，1973），頁 464。

十一月二十九日下達指示：「聽聞越前丹山順藝義已完成建仁寺高麗一切經之校對，東本願寺本山宗主也耳聞此事，並下令順藝再校對另一藏。」命順藝另製一藏奉納本山。²⁹

然而，在製作第二藏的途中，順藝於弘化四年（1847）過世，享年 60 歲。此藏的製作工作，由其長子順尊繼承，安政三年（1856）五月，校對完成的黃檗藏被納入東本願寺。東本願寺追封順藝為「贈擬講」（東本願授予的第二學位，作為該人死後的獎勵）以及「贈嗣講」（東本願授予的第一學位，作為該人死後的獎勵）。近代的昭和二十五年（1950），另追封其為學寮最高位的「講師」。

六、繼承了智洞目錄格局的藏書目錄

（一）《丹山文庫目錄》

淨勝寺除了與建仁寺麗藏對校過的黃檗藏，還有其他種類的豐富藏書。淨勝寺經堂左右兩側架上陳列了校讎的經藏，其左右壁際尚有圖書數千冊，總稱「丹山文庫」。

根據真宗大學（現在的大谷大學）圖書館長山田文昭於明治四十一年（1908）八月製作的《越前絲生淨勝寺現存所藏目錄》，丹山文庫收藏宗乘一千三十七冊，異流一百十四冊，餘乘二千三百九十八冊，合計三千五百四十九冊。³⁰ 順藝涉獵群籍之廣可見一端。

淨勝寺有兩種藏書目錄，第一種成書年代不明，版心可見「紅梅園藏」，估計為幕末近代製作的目錄，詳情不明。

另一種則為順藝親製的藏書目錄，號稱「丹山文庫目錄」。該目錄分二冊，有字頁數共一百八十四葉，分類依據《千字文》，自「天」至「皇」，共八十字號。收錄範圍僅限佛典，除經部以外，還有經疏、論疏、各宗疏、史紀、目錄部分類。有些分類，雖有立項，內中未列書目，多有空白紙張，推測為未定稿。³¹ 想必

29 《上首察日記》，收入大谷大學真宗總合研究所編，《上首察日記Ⅱ》（京都：大谷大學真宗總合研究所，1988），頁 65。

30 山田秋甫，《淨勝寺丹山》，頁 47-49。

31 關於《丹山文庫目錄》，主要參考了織田顯信，〈淨勝寺本《信海聞書》について〉，收入氏

是先確定目錄的整體結構和分類，然後打算陸續將自寺藏書依類別填入，但最終此目錄未能完成。

《丹山文庫目錄》的結構非常獨特。若是通常的藏書目錄，順藝既為真宗學僧，想必要先列「宗乘」著錄真宗書籍，然後將其他佛書作為「餘乘」羅列其後。然而，《丹山文庫目錄》先列「支那大乘釋經部」、「支那大乘釋律部」、「支那雜著（著）部」等大項目，然後在「支那大乘釋論部」下分「無量壽經論」、「大智度論」、「十地論」等小項目，再填入相關藏書的書名。若是日本製作的佛書，就立「日本大乘釋經部」、「日本大乘釋律部」等大項目，再於「日本大乘釋經部」下分立「大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等小項目，在各項下收錄相關佛書。

舉例而言，《丹山文庫目錄》所立的大項目如下。

別本大乘經

別本律

別本論

支那大乘釋經部

支那大乘釋律部

支那大乘釋論部

支那小乘釋經部

支那小乘釋律部

支那小乘釋論部

支那雜著（「著」）部

日本大乘釋經部

日本大乘釋律部

日本大乘釋論部

日本小乘釋經部

日本小乘釋律論

日本小乘釋論部

日本外道釋論部

顯然，《丹山文庫目錄》的格局呈顯了對大藏經的強烈意識，作為近世期藏書目錄則極為罕見和特殊。

（二）智洞編《龍谷學覺內典現存目錄》

其實，這並非順藝的首創，《丹山文庫目錄》仿效了天明三年（1783）成立的智洞編《龍谷學覺內典現存目錄》（五卷）（圖3）第三卷到第五卷的目錄結構。

智洞（1736-1805）曾擔任近世期淨土真宗本願寺派（本山為西本願寺）檀林最高的能化一職，也是日本近世期最大的宗教論爭「三業惑亂」的核心人物。³²

智洞雖戰敗後死於牢中，其對檀林藏書的充實有卓越貢獻，也是推動藏書變革的重要人物。智洞致力於珍貴典籍的蒐集，曾抄寫東寺觀智院寶庫秘藏四百餘年的淨影慧遠《涅槃義記》十二卷等納入西本願寺檀林。這些珍貴藏書目前收藏於西本願寺檀林後身的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該館佛書藏書的質量，高居日本國內大學圖書館的前茅。

智洞編《龍谷學覺內典現存目錄》全五卷，第一、二卷收錄嘉興藏正藏，第三卷以後為續藏、又續藏、以及日本佛書等，參雜寫本和刊本。（除此以外，還附有一部外典的目錄。）其各項下的書目排列，例如第一卷起首的「天竺大乘經藏」項目中，先列「淨土部」，以下為「華嚴部」、「法華部」、「涅槃部」、「般若部」、「方等部」、「密部」等，其他各項也將淨土教關係書目列在首位，體現了智洞的淨土真宗的宗派立場。依照這一系列順序，將嘉興藏的書目全部重新排列。換句話說，《龍谷學覺內典現存目錄》是在嘉興藏的經錄基礎之上追加了日本佛書，又重新組織編制的嶄新形態的大藏經目錄。

智洞錄包括內典四千五百七十七部、外典一百二十二部，總計四千六百九十九部的藏書實錄。自佛教傳來，不但眾多佛書傳至日本，在佛書出版興盛的日本近世，可謂極為實用並且搜羅廣泛的佛書目錄，可以從整體上縱覽當時日本的佛教藏書。

32 為淨土真宗本願寺教團內部有關正道邪道的爭論。直接原因來自於寬政九年（1797）智洞就任於教團學寮領導時的演說。此亂之後擴大影響，最終波及至全國的僧侶及信徒，演變到後來教團自身無法收拾的程度。文化三年（1806）年幕府下定裁決，智洞被認為偏離正道，而後死於獄中。

順藝的《丹山文庫目錄》繼承了智洞錄的結構。當然，在起首處設置「別本大乘經」、「別本律」、「別本論」等新項目，屬於順藝的首創，有待日後的分析。

智洞當年有意將《龍谷學覽內典現存目錄》出版發行，而最終因三業惑亂客死獄中未果，³³ 因此該目錄還是呈現手抄本的狀態。但即便該目錄對後世的影響不大，順藝還是設法獲得此目錄手抄本，著眼並模仿智洞目錄的整體結構，應用於自身藏書目錄，可見他一方面以自身所屬宗派的典籍為核心，同時關注傳世佛書整體的廣角視野。

七、古寫經的收集

（一）摹寫本《無量壽經記》

順藝生前蒐集了大量的古寫經。除了上文提到的《金剛般若論會釋》、《金剛般若經贊述》校訂之際採用的古寫經，還有高山寺本《無量壽經記》等精緻的摹寫本傳世。此高山寺本《無量壽經記》，他的恩師深勵也曾在高山寺令弟子抄寫並在講義中使用。深勵的抄本，在高倉學寮也被人抄寫和使用，後來成為《大日本校訂訓點大藏經》（卅字藏經）的底本，但其中多有文字的失誤。³⁴ 而順藝的摹寫本，包括原件中的蟲蛀處和藏書印的闕失部分在內，忠實再現了原件的形態，毫釐不差。

此外，順藝還製作了高山寺舊藏本（現野村美術館所藏）《安樂集》的摹寫本。³⁵ 高山寺本是奈良時代（710-784）後期至平安時代（11世紀中葉至12世紀末）初期的極為古老的一種文本，順藝摹寫本直接參照了高山寺本原件。另外還有極其珍貴的《金藏論》、³⁶ 《日本往生極樂記》等的相關記載。

如前所述，深勵採用的坂東本是他人抄寫的文本，而順藝摹寫本幾可以假亂真。可見順藝蒐集古寫經的能力尚在其師深勵之上。

33 龍谷大學三百五十年史編集委員會編，《龍谷大學三百五十年史・通史編・上卷》（京都：龍谷大學，2000），頁344-347。

34 佐佐木大悟，〈深勵所持の玄一《無量壽經記》（龍谷大學圖書館藏）をめぐる〉，《龍谷大學論集》，494號（2020.3），頁2、11、15。

35 越前町教育委員會編，《丹山一幕末を生きた學僧一》，頁12。

36 除了《丹山文庫目錄》，還有版心註明「紅梅園」的藏書目錄。

（二）收集古寫經

此外，淨勝寺藏書中包括法隆寺古寫經，經目可見山田文昭的目錄《丹山文庫圖書目錄》，包括卷子裝四十五點、古寫經一百二十點。該目錄題簽有「上」字，估計另外還有下卷（或中卷）。另外或許還有其他的古寫經。

順藝藏書中的貴重書，明治末年的山田文昭調查之際移至大谷大學收藏，法隆寺古寫經也在其中。大谷大學藏本中大約包括九十卷法隆寺古寫經，是法隆寺以外的最重要的法隆寺一切經的收藏單位，其核心部分應該就是順藝的藏書。可見順藝在珍貴古寫經收集方面的貢獻。

八、結論

順藝的學問特徵，通過《金剛般若論會釋》、《金剛般若經贊述》的校訂，可見其追求正確文本的態度，通過他忠實摹寫坂東本可知其忠實於原典的姿態。另外，順藝編纂的藏書目錄《丹山文庫目錄》，繼承了江戶中後期同宗他派學僧智洞目錄的結構，顯示出關注傳世佛書整體的廣角視野。最後，他還蒐集了包括法隆寺古寫經在內的貴重典籍。

近代以後，對親鸞著《教行信證》的研究取得長足的發展，對於近代以前的坂東本研究的問題點，藤原智有以下的評述：

- ① 中近世，坂東本的閱覽非常困難。
- ② 關於《教行信證》的引用文研究，互相之間內容頗有出入的大藏經和古寫本的全面性比較研究無法實現。³⁷

順藝製作了坂東本的精確摹寫本，可見他克服了第一個難關。關於此事也可同時印證於《金剛般若經贊述》。也就是抄寫其認為擁有正確本文之優良的文本並進性校對。

針對第二個問題點順藝也可說具備了明確的自覺。他將以大藏經為首的所有經典都列入其視野進行校對。他經常進行與高麗藏的校對，並收集且臨摹古寫

37 藤原智，〈《教行信證》における引用文について—古寫經本による再検討—〉，《近現代《教行信證》研究檢證プロジェクト研究紀要》，3號（2020.6），頁64。

經。致力追求更好的文本即為順藝的特徵。

關於大正藏，今年來有些事例研究對其信賴度提出質疑。³⁸ 若從敦煌寫經等來看，麗藏似乎無法號稱最優善本。若要求得精確的文本，就必須正向面對第二個問題點的各種文本研究。從這一角度而言，近世期的順藝校對經文一字一句的嚴謹態度和宏觀視野，對於我們面對日本世代相傳的廣博佛書，有著重要的啓示。在利用刊本學習的風氣濃郁的近世期，順藝為近代佛教學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是有待今後研究的重要人物，³⁹ 而順藝的大藏經校訂，可以說是順藝人物形象和偉大業績的重要層面之一。

38 會谷佳光，〈増上寺報恩藏（西蓮社）と《大正新脩大藏經》の編纂—初步的調査分析を通して—〉，《佛教史學研究》，60卷2號（2018.3），頁84。

39 落合俊典對順藝的評價極高，稱其為「世界性的重要人物」，參見落合俊典，〈一切經傳播の鍵を握る經錄—近世寫本《貞觀錄》から考える—〉，《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55號（2017.3），頁226-228、231。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江戸) 窺基，《金剛般若經會釋》，文政時期，大谷大學圖書館藏（請求記號：餘大2373）。
- (江戸) 深勵，《廣文類會讀記》，卷 1-18，收入真宗典籍刊行會編，《真宗大系・第 14、15、16 卷》，東京：真宗典籍刊行會，1926 年改版。
- (江戸) 香巖，《大藏經校合の記》，江戸時代晚期，大谷大學圖書館藏（請求記號：餘大6677）。
- (江戸) 順藝，《御文研鏡》，收入真宗典籍刊行會編，《真宗大系・第 32 卷》，東京：真宗典籍刊行會，1918。
- (江戸) 順藝，《稱名信樂二願希決》，收入妻木直良編，《真宗全書・第 55 卷》，京都：藏經書院，1915。
- (江戸) 佚名，《粟津家日記》，收入東本願寺宗學院編修部編，《東本願寺史料・第 2 卷》，東京：名著出版，1973。
- (江戸) 佚名，《上首寮日記》，收入大谷大學真宗總合研究所編，《上首寮日記Ⅱ》，京都：大谷大學真宗總合研究所，1988。

近代論著

- 川上孤山，《增補妙心寺史》，京都：思文閣，1975。
- 山田秋甫，《淨勝寺丹山》，福井：丹山文庫，1914。
- 田代俊孝，〈越前丹山文庫所藏麗藏校合黃檗版一切經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0 號 2 期，1982 年 3 月，頁 230-234。
- 上杉文秀，〈《教行信證》御延書本に就て〉，《宗報》，246 號，1922 年 4 月，頁 2-5。
- 金子大榮著，讀言南無者譯，《信珠院順藝師宗典研究稱名信樂二願希決》，京都：文榮堂書店，1988〔1932 初版〕。
- 萬波壽子，《近世佛書の文化史－西本願寺の出版メディア－》，京都：法藏館，2018。
- 三浦眞澄，〈《教行信證》傳授の一試論－寂如上人御講義を通して－〉，《真宗學》，140 號，2019 年 3 月，頁 85-109。
- 松永知海編，《秋季特別展・高麗版大藏經の諸相》，京都：佛教大學宗教文化ミュージアム，2012。
- 松永知海，〈黃檗版一切經の話－鐵眼禪師の出版事業と越前－〉，《越前町織田文化歴史館研究紀要》，4 集，2019 年 3 月，頁 49-54。
- 佐佐木大悟，〈深勵所持の玄一《無量壽經記》（龍谷大學圖書館藏）をめぐって〉，《龍谷大學論集》，494 號，2020 年 3 月，頁 1-23。

- 落合俊典，〈一切經傳播の鍵を握る經錄—近世寫本《貞觀錄》から考える—〉，《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55 號，2017 年 3 月，頁 211-235。
- 會谷佳光，〈増上寺報恩藏（西蓮社）と《大正新脩大藏經》の編纂—初步的調査分析を通して—〉，《佛教史學研究》，60 卷 2 號，2018 年 3 月，頁 70-91。
- 馬場久幸，《日韓交流と高麗版大藏經》，京都：法藏館，2016。
- 鳥越正道，《最終稿本教行信證の復元研究》，京都：法藏館，1997。
- 織田顯信，〈淨勝寺本《信海聞書》について〉，收入氏著，《眞宗教團史の基礎的研究》，京都：法藏館，2008，頁 125-143。
- 藤原智，〈《教行信證》における引用文について—古寫經本による再検討—〉，《近現代《教行信證》研究檢證プロジェクト研究紀要》，3 號，2020 年 6 月，頁 63-107。
- 藤原智，〈江戸期における坂東本《教行信證》の活用（上）〉，《教化研究》，166 號，2020 年 7 月，頁 212-225。
- 齊藤隆信，〈義山の元祿新彫《撰擇集》に見る淨土宗學の一側面〉，《淨土宗學研究》，39 號，2012，頁 133-157。
- 越前町教育委員會編，《丹山—幕末を生きた學僧—》，福井：越前町織田文化歷史館，2008。
- 龍谷大學三百五十年史編集委員會編，《龍谷大學三百五十年史・通史編・上卷》，京都：龍谷大學，2000。

圖版出處

- 圖 1 《金剛般若經贊述》封面和上卷第十四葉，京都大谷大學圖書館藏，京都大谷大學圖書館提供（請求記號：餘大 2696）。
- 圖 2 《金剛般若經》（《黃檗版大藏經》）封面和第三葉，京都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藏，京都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提供（請求記號：203.1/2-w/150）。
- 圖 3 《龍谷學覺內典現存目錄》第一卷第九、十葉（《龍谷學覺大藏目錄》），京都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藏，京都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提供（寫字台文庫，請求記號：000.1/63/5）。

Tanzan Jungei: On His Studies and Book Collection*

Mannami, Hisako**

Abstract

Tanzan Jungei (1785-1847), a scholarly monk at the end of the Edo period (1603-1867), is known for his meticulous edition of the *Daizang Sutra* based upon the Koryo version, which was the most highly regarded version of the period, and of which Nincho (1645-1711) had already made a critical edition in the mid-Edo period. Jungei's academic knowledge, skills, and fidelity toward the texts were exceptional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of Japan. In his edition of the *Daizang Sutra*, Jungei tried to copy the *Rizang* more correctly than Nincho: he aimed to procure a text which would be more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Jungei also attempted to restore the main works of Shinran (1173-1263), the founder of his denomination. This is unique in Japanese Buddhist studies in the Edo period when scholars studied them only in later printed texts. In addition, Jungei collected a large number of sutras and their copies and made a unique catalog of his collection, the structure of which was influenced by the "Existing Catalogue of the Ryukoku School Library" by Chido (1736-1805), a scholar of another school of the same denomination. Chido's inventory was special in that it mixed Japanese Buddhist texts with the Jiaxing collec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Jungei made a big step toward new Buddhism studies, based upon the originality of his methods.

Keywords: Tanzan Jungei, *Daizang Sutra* based upon the Obaku version, *Daizang Sutra* based upon the Koryo version, publishing culture, Bandō Manuscript of the *Kyōgyōshinshō*, old sutras

* Received: 18 February 2021; Accepted: 2 December 2021

** Part-time Lecturer, Ryukoku University, Japan



圖 1-1 《金剛般若經贊述》封面
京都大谷大學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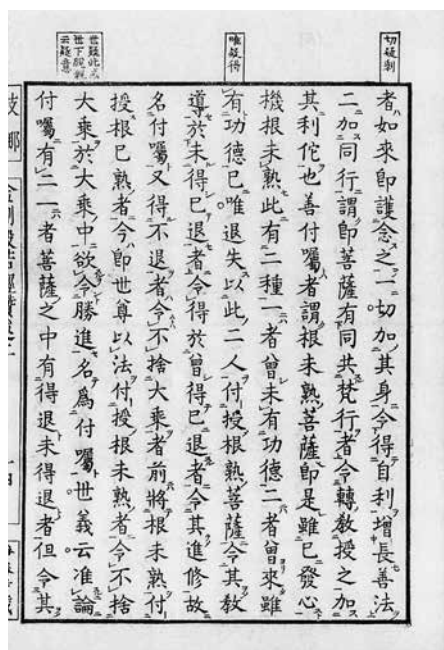


圖 1-2 《金剛般若經贊述》上卷第十四葉
京都大谷大學圖書館藏



圖 2-1 《金剛般若經》（《黃檗版大藏經》）
封面 京都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藏



圖 2-2 《金剛般若經》（《黃檗版大藏經》）
第三葉 京都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藏



圖3 《龍谷學覺內典現存目錄》第一卷第九、十葉（《龍谷學覺大藏目錄》） 京都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藏